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13位ISBN编号：9787500095260

出版时间：2015-4

作者：[日]安川寿之辅

页数：345

译者：刘曙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内容概要

安川寿之辅的《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构丸山谕吉神话》是《福泽谕吉的战争论与天皇论》的姊妹篇，包括两个主要内容：1，剖析和批判福泽谕吉的思想本质；2，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驳斥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主流派学者”们歪曲事实美化福泽谕吉的错误观点。作者指出，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大的保守主义者，他拥护天皇的专制制度，污蔑并扼杀日本国内民主化运动，对外宣扬侵略扩张，敌视*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是当时掌握日本国家政权的极右翼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显示全部>>](#) [隐藏全部>>](#)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作者简介

安川寿之辅(1935-)为日本知名学者，名古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前后任教于埼玉大学、名古屋大学。主要著作有《福泽谕吉的亚洲观》《福泽谕吉的战争论与天皇论》《日本近代教育的思想构造》《十五年战争与教育》《日本近代化与战争责任》等。

刘曙野，朝鲜族。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韩语言比较、文化比较。现任吉林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韩国外国语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金刚大学、韩国江南大学客座教授、特聘教授。主要著（译）作有《中日韩汉字词比较研究》《中日韩词源探索》《中日韩经贸词汇比较集成》《日语汉字词典》《探寻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福泽谕吉的战争论与天皇论》及《世界各国（地区）税务代理人制度》等。显示全部>> 隐藏全部>>

书籍目录

福泽谕吉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的评价——丸山真男视而不见的福泽谕吉重要论述

序言——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研究手法

1. “《文明论之概略》=福泽原理论”破产的证据

A.对“权力之偏重”由排斥到接受

B.天皇制观——从排斥“惑溺”到利用“笼络愚民”的骗术

C.从肯定和主张变革转为对历史实用主义、封建制度的肯定

2.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赞美和积极肯定

A.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尽情赞美

B.对《教育敕语》的评价——《时事新报》社论

C.对《修身要领》的评价——“独立自主”和天皇制

D.对《教育敕语》的评价——《时事新报》社论

E.受丸山“福泽神话”影响的具体事例——小泉仰、山住正己等

福泽接受《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的思想路程

1.福泽的忠孝思想——“反儒教主义论”的内涵

A.福泽的忠君论

B.福泽的孝行论

C.福泽的所谓“反儒教主义论”

2.启蒙初期福泽的局限性及其变貌的前兆

A.再论定式“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

B.克服国民国家的路程——以“拒绝兵役的良心”为中心

C.《文明论之概略》第十章问题

D.变貌的前兆——《备忘录》的地位

3.保守思想的确立=中期的福泽谕吉(1877年—1894年)

A.向保守思想的过渡——《通俗国权论》与《民情一新》

B.福泽谕吉与明治政府的关系.

C.《时事小言》与《帝室论》——保守思想的确立

D.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人为的国权论和排外主义.

E.同时代人对福泽谕吉的批判——“祸不可救，遗患将来”.

4.走向《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路程.

5.走向《教育敕语》的路程.

A.福泽的忠孝思想与《教育敕语》.

B.“福泽=‘近代人物类型’”的错误.

C.日本魂、“完全之文明开化人”、新华族制度论

D.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守护者——福泽谕吉.

6.“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确立以后福泽走过的路程.

A.对工人运动、阶级对立的警戒与警钟——日本资本主义的守护者.

B.甲午战争与福泽谕吉.

C.走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路程.

对启蒙初期福泽思想的重新评价——对“人云天不造人上之人”的再思考

1.思想史研究方法——丸山真男的方法

2.“人云天不造”问题

3.《劝学》初编的自由论

4.《劝学》中的自由与平等论

A.福泽的“自由”——“武者之道”的“体面与名誉”一

B.《劝学》初编的平等论——教育万能论及其批判一

C.福泽不是平等论者”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 D. “撤藩置县”后保留“秩禄处分”的建言书..
- 5. 《劝学》与启蒙初期福泽的国家观=人类观
 - 怎样评价福泽谕吉——近代日本最大保守主义者的真面目及其思想
 - 1.福泽谕吉的真面目
 - A.长子的婚姻问题——露骨的士族精英意识与町人蔑视”
 - B.家长制女性歧视论——女儿教育与对女“乞丐”的态度.
 - C.不许从二楼俯视——“感泣”天皇的福泽
 - D.“忠臣孝子”的日常性
 - 2.思想家福泽谕吉改弦易辙了吗
 - 3.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评价
 - A.福泽的日中文明比较论——桥川文三与丸山真男
 - B.“教育与宗教之冲突”争论事件和久米邦武的“神道为祭天古俗”事件
 - 4.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保守主义者
 - A.丸山的《隐忍之说》论与《丁丑公论》论
 - B.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保守主义者
- 资料篇：丸山真男视而不见的福泽谕吉重要论述
 - I证明“《文明论之概略》=福泽的原理论”破产的资料
 - 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的赞美和积极肯定
 - 走向《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的思想路程
 - 《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确立后的福泽谕吉
- 人名索引
- 后记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精彩短评

1、文本分析详尽，很赞，立场很正，对福泽的批评没话说，对丸山的批判稍有点过，不过基本观点我还是赞成的，而且独立的批判精神难得。总而言之是个值得敬佩的老爷子^_^
不过我也对丸山为啥挑福泽做战后民主偶像觉得困惑，选中江兆民不是好很多嘛。。。

2、垃圾书

章节试读

1、《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29页

即1882年8月的《六合杂志》上，吉冈弘毅发表了《驳福泽氏耶稣教论》。此前他通过极富原理的长文，提出了批判征韩论的“建议”。1870年，吉冈作为当时第一个正式的外务省代表，与朝鲜进行过建交谈判。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唇齿辅车的亚洲联合观点。他指出：“方今，东洋诸国有·...受西洋诸国凌辱之患。当此之时，需与支那及朝鲜，如同唇齿之国，格外厚其亲睦，以缓急相救为良策”吉冈还认为：“汉学者与邻国相亲，为国之利，不可起无名之师。此主张，远优于福泽论之名言。”吉冈批判福泽《时事小言》的观点道：“我已看破，福泽氏蔑视汉学者，厌恶耶稣教徒之根源，专在于其掠夺主·...今世为竞争世界，故可不顾理与非理之一切。若能夺地，可暖其身，岂有为寒所迫之事乎？不必谦让。大可随意取之。该主张·...此乃图谋变我堂堂日本帝国为强盗之国者也”他进一步严厉批评道：“如此不义不正之外交政略，决非增加我帝国之实利者。...徒结四邻之怨，受万国之憎，必留不可救之灾祸于将来。岂能谓之扩张国权之良策乎”正如我在前著的最后一章《走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路程》中论证的那样，事实上，福泽谕吉引导日本走向侵略亚洲的道路，成为了日本近代化路程的“总导师”。吉冈的上述批判是对他的最具原则性的批判。而且，日本根据福泽的“掠夺主义”走向了“强盗国”的道路（导致200万亚洲各国人民的牺牲和30万日本本国国民的死亡）“留下不可救之灾祸于将来”，如今仍然理所当然地被亚洲人民揭发和追究战争责任。我们可以评价，吉冈的这种批判，正确地预测到了日本这种近代化、现代化的未来。

2、《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4页

丸山真男把《文明论之概略》视为福泽“唯一的原理论”他认为，“甚至在福泽的国权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关于限制政治权力对内影响的原则性观点丝毫也没有动摇（《丸山集》卷，26）他以这种非常严格而具有原则性的姿态认为“《概略》的基本原理和他的独立自主信条一起，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丸山集》14卷，347）。但是，了解《日本国会缘起》的读者，大概仅凭上述议论就会对丸山的观点产生很大的疑问吧。（14 - 15）

《文明论之概略》到《日本国会缘起》的观点变化（14 - 16）

A, 对“权力的偏重”由排斥到接受

B, 天皇制观——从排斥“惑溺”到利用“笼络愚民”的骗术

C. 从肯定和主张变革转为对历史使用主义、封建制度的肯定

福泽在《概略》的序言中称，历史的进步为“一身经二生，一人有两身”（《全集》卷，5）把其过程中人心的变化称之为“所谓今吾非昔吾即是也”（同上，53）。丸山把《备忘录》的一部分评价为与《概略》同等重要的准原理论，但福泽却在《备忘录》中，把促进“两身”进步的变革志向记录为“志不可不随时而变，说不可不依世势而改。今吾昔吾，恰如二人，才有世事之进步”（《全集》卷，658），根据这种志向，福泽在《概略》中指出：“权力之偏重·...，如非察此弊害而除偏重之病：...文明决不可有进步。”（《全集》卷，171）他呼吁学者要承担将民众从“权力之偏重”和“惑溺”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忧国学者，唯须主张文明之说，不分官私之别，将其解救于惑溺之中，以努力改变众论之方向。”（同上，67）

然而，福泽却在《缘起》中，将民众从“权力之偏重”和“惑溺”状况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民权运动诽谤为“无益之恶作剧”、“风前微尘”，明知“所谓百姓町人至今仍为百姓町人”的现状，却改变其态度，重新评价封建制道：

“德川之封建·...达日本文明之顶点。”尔后他对“对“将帝室神圣·...仰奉为上天之高”的民众，因“权力之偏重”和“惑溺”之文明而形成的、可称为“顺从、卑屈、无气力”的先天之性”做了肯定的解释。他说，人生“以今吾忆昔吾，前后恰如二生”，世上也有可能如此变革之人（福泽就是在《概略》中如此主张的人，但对此却佯装不知是他的一贯作法：“凡遗传者，发于人生不自勉、不自知之所，其势欲禁而不可禁，教育亦不可导之，命令亦不可制止，一种微妙能力。”也就是说，历史上、遗传上形成的国民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福泽明显地摇身（心）一变，成了呼吁根据这种国民性来发展日本今后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家”。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17 - 18)

3、《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69页

丸山在《福泽谕吉的为人思想》中写道：“所说的福泽根据现在的情况，必须选择他，推销他。”...或者必须强调在自己所属的集体中无法发现或者不足的思维方式及价值。”正因为丸山有这种“使命”感和心愿，所以他说，“总而言之，福泽的言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总是具有使命意识（《丸山集》15卷，298~308）同样我也在想，在刚刚从“黑暗的谷底”中解放出来而且战败后不久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处于占领军的统治之下，当遇到预想不到的民主化启蒙机遇时，丸山的心境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4、《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73页

思想史必须根据严谨的史料考证得到证实...史料对象的制约，因历史对象本身的框框而受到严格限制，不能经受这种制约和限制的‘浪漫主义者’和‘独创’思想家，也都不适合搞思想史研究”（《丸山集》9卷，69）“当学者以现实的政治事象和现存的各种政治性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时，从内心上引导他的必须总是真理价值。政治学不应该成为特定政治势力的奴婢.....要时刻警惕因希望和欲望而产生的认识上的乌云，因此结果反而能深入到事象的本质”（《丸山集》：卷，145~151“研究者作为一个市民，即使是属于某一个政党，只要他进行的是真正的研究，也要防止把它变成成政治势力的奴婢，在政治欲望、希望、好恶方面做到‘禁欲’...越关心政治，越对政治持有强烈欲望的人，越能自觉地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拘束性，因此越能客观地看问题”（同上，376）

丸山的福泽研究迎来了以战败告终的战后时代，他也许出自“在现实状况下必须选择它、推销它”的判断，为了寻求在军国主义日本“无法发现或者不足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着眼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告诉人们日本也有过这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也许他的行为是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启蒙而奋斗的善意行为。但是，用他本人的严厉语言评价他的行为，可以说他忽略了“严谨”的“史料考证”和“真理价值”，懒于“警戒”和“禁欲”因政治性“希望和欲望而产生的认识上的乌云”，所以他“没有经受住史料对象的制约和因历史对象本身的框框而受到严格限制”，付出了“浪漫主义”式编造研究劳动。

173 - 174

5、《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78页

电影《专家》中的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时代有才华的军部官僚，他很好地适应社会，作为组织的一员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和命令，出色地完成任务。电影向人们提出了疑问，他犯罪的意义何在？如同调教家畜一样，强迫人们忠于国旗和国歌的教育，让日本的儿童、青年顺从式地适应社会和组织，是他们作为组织的一员埋在集体之中行动，这是一种过分的追随集体训练他们像他们的先人一样，在法制之下再次犯下“对于人道白罪行”，这是培养“潜在艾希曼”的教育犯罪。

6、《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33页

福泽认为，“敬仰君主之理由”在于“为统一不完全民心之所归而必要”，他以“君主之地位不可轻易动摇。：...·君主之动摇即民心之动摇”为前提，说明了甚至“牺牲生命财产”对“君主”“尽其忠义”的理由：并不是“按君主严命而不得不为之”；2“非为报其所蒙之恩而为之”；也不是为报答来自奉禄的“为衣食而尽忠义”。福泽认为，“唯自尊自重，不忘为人之本分，随其本心所指，自然实践忠义之道”才是“独立自主”的忠义（同上，的6）“仁义忠孝”之道，当然不可能是近代“市民精神”。当然，观察一下“独立之孝”，人为什么必须忠于君主、孝敬父母？我们也无法从福泽提供的论据中找到“市民精神”。对福泽而言，孝敬父母是“人类高尚至极、灵妙至极之本心”。

北冈伸一认为，福泽基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之本分积极主动地实践了“仁义忠孝”。正是他的这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种“独立自主精神”使“第三次开国”，即打开现在日本的“闭塞状况”成为了可能。然而，现代的年轻人对这个观点会持何种态度呢？

33 - 34

“独立自主”几乎并不意味着近代式个人主体性的自立“奉戴帝室，仰其恩德”的“臣民”精神与“独立”、“自尊”毫不相干。 39

7、《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258页

但是，丸山真男始终支持和高度评价的“支那与日本文明之异同”，相反，桥川把福泽的分为“空洞的想法”。先观察一下桥川的观点吧：

“福泽对日本的文明适应性给予所谓的希望性评价。这里有一个重大的漏洞。换句话说，福泽就伴随日本的社会价值关系复杂化而产生的“自由之风”，强调其抽象的可能性。相反，他没有注意到支撑这种“自由”的社会集团与个人自立成长在现实中是多么困难这一社会实态。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传统性、静态性价值体系的巨大压力顽固地阻碍文明发展的的事实，但他对这种阻碍因素的的强大程度有可能保障从底层社会进行彻底近代化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构想。”

桥川为了补充和完善这种见解，引用了竹内好的以下论述（《日本人的中国观》）：“据杜威的观点，日本由于传统传统的压力较少，所以很容易成功地引进欧洲的技术，所以反而保留了古老的东西。中国由于传统势力的强烈抵抗，错过近代化的时机，所以反而彻底实现变革，从而能够站立在国民心理变革这种根源性基础之上。”

关于桥川的这个评价，我并不认为福泽“没有注意到个的自立成长在现实中是多么困难这一社会实态”。我认为他是为了确保优先课题“自国独立”，才保留“文明旨”的“个人自立”课题，最终并没有为完成这个课题而迈出过一步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把此后从“八年抗战”到中国革命成功的脚步放入我们的视野，我就觉得应该支持桥川把福泽的《支那与日本文明之异同》看成是错误的观点。

258 - 259

8、《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74页

我“对丸山的批判仅限于丸山对福泽（研究）的批判”（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和《陆羯南一人与思想》这两篇论文为代表）他说：“由于没有对‘超国家主义，和‘健全的国家主义，这两项对立的框架……本身进行批判没有深入到国民主权论本身的相对化问题而感到焦虑不安，正如旧著的副标题为“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研究”那样我一直把福泽的教育思想当做我的研究主题，不得不与把福泽解释为近代日本“健全国家主义”思想典型和代表的丸山进行正面对立。因此自1970年旧著问世以来，我一直对丸山的福泽研究进行了批判。把“超国家主义”和“健全国家主义。这两项对立的框架本身排除在批判的视野范围之外，这暂时是关系到我的研究范围问题。我认为，在这个被限制的范围之内，论证丸山福泽研究的错误，解构他的福泽神话，等于暗示着对丸山的政治思想研究总体，进而对上述两项对立框架本身进行重新认识的必要性。但是，直接着手进行这个研究本身，对我来说是另一个研究课题

今井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我的论证本身，即我不是在论证福泽的思想，不是丸山所说的“健全国家主义”，而是我的研究姿态：在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把丸山所说的“健全国家主义”本身当做批判和剖析的对象。无论在前著中还是在本书中，我对福泽启蒙初期的业绩给予了高度的积极及评价：如，启蒙初期的福泽具有卓越的历史观，他认为，他自己当做最大课题的“自国独立”的确保“在文明论之中不过是琐碎一条而已“文明本旨”要求在确保国家独立的基础上，同时完成

个人的自由独立”和“个人自立”，他把这个问题的探索当做自明的课题，公开承诺把它“留于第二步，他日有所为这个承诺是可以简化成“一国独立而个人自立”定式的。然而，今井指出，安川对福泽启蒙初期的思想框架做如此的重新把握是以与丸山的“国民国家”相同的框架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今井弘道认为：“我想在原理上对任何意义上的国民主体和国民主权连同国民国家一起予以否定。因此，我不接受‘国民的战争责任，。”今井是因其相同的框架而对安川进行批判的。这一点上，

今井对安川的批判，一半是中恳的。

74 - 75

我说今井的批判一半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前述西川长夫观点的评价，即关系到“国民主义处于被国家主义吸收的命运”、“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体制是国民国家的下一个层次上的区分”等问题的评价。这是否定和批判“国民战争责任论”的今井与我之间的对立问题。从国民国家论中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不认为“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体制”各自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我也不同意认为它们本质上相同的观点。他批判我，实际上没有找好议论”“国民国家”论的“出路”，或“厌烦国民国家论”（《国境》，470）“原因”在于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我认为这些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与由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今井说：重要的问题反而是：在对‘日本国家，和（对战争没有感觉的）’多数派国民，进行批判时，追求跨越国境树立（超国家）‘亚洲共性’，在这个追求过程中团结受害者，想把（人们）囿于排他性壁垒之中，我们弹劾的就是这种立场”我对今井的战争责任构想本身暂时没有异议。问题是，我们怎样批判“日本国家”和“多数派国民”，才能“树立跨越国境的亚洲共性”，“团结受害者”呢？在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今井和我有很大的差异。我认为，作为主权者的日本国民（据今井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市民）首先要承担和解决自己国家战争责任的诸课题，这是先决条件。树立“亚洲共性”团结受害者”是其产生和形成的结果。75 - 76

如前所述，否定“国民战争责任论”的今井弘道，在追求“跨越国境树立亚洲共性”时，寻求“团结受害者”。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作为主权者日本国民，在树立“亚洲共性”，“团结受害者”之前，无论如何首先以宪法第九条、“和平生存权”、“市民和平诉讼”为武器，全力阻止正在重走战争之路的日本动向，这是先决条件（我想不会恢复征兵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要寻求确保“凭良心拒绝兵役的合法化”）。

而且对走向战争国家、“有事法制”之路的日本的以下行为我们要做到：对强迫人们忠于“太阳旗君之代”行为，要依据“思想、良心、信教自由”的教自由”的原理，断然予以拒绝；对小泉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提起违宪诉讼；关于教科书审定问题，在以前前的家永教科书诉讼和

现在的高嶋（横滨）教科书诉讼问题上坚持斗争（我是以原告的身份和口头辩论的形式参加这些诉讼的）。也就是说，我们无论作为国民还是市民，如果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自己所在的地区、自己的国家，对与战争有关的所有动向进行正面斗争，就不可能“团结”亚洲战争的“受害者”，也不可能追求和形成“亚洲共性”，更不可能承担战争责任。因此在这个斗争中，必须以“思想、良心、信教自由”为排头兵。在“国民国家”的宪法原理和把法律当作武器的问题上，我不敢苟同今井的观点：在世界史的现阶段，突然突然“打破‘主权国’从原理上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国民性主体和国民主权”。80—81

9、《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58页

此次阅读《丸山集》，我发现福泽神话的“教祖”提出了一些更为肯定性的解释：“每一个人成为主体，承担国家的命……这就是福泽的‘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没有个人的自立，哪有国民的独立，啊。那就是爱国主义，它是与所属的、依赖式的‘国家’，意识相反的。这才是福泽提出的最根本的命题，我想它几乎是永久的革命性课题”（《丸山集》卷，221）55

《资料篇》12的定式中说，没有“独立气力”的人民导致三种“灾害”：“思国之情不深切”；2“与外国人接触时亦不能伸张独立之权义”；3“有时追随他人做坏事，因此，福泽提出判断：“国中之人，无独立之气力时，不能伸张一国独立之权义”他呼吁，人民要揩去“柔顺如家养犬”的“平民根性”，培养“逛独立之气力”。而且，他所寻求的“充满全国”的重要“独立之气力”和“自由独立之风气”，其内容就是：立该刻为“国家不仅可以失去财产，抛弃命亦不足惜的“报国大义”。56这一点是可以根据1870（明治三年）1月福泽写给九鬼隆一的书信中得到证实的。在这封信中，福泽可能是第一次表述“个人自立……及于一国”。福泽写道：“个人自立于一国，一家自立于一国，我日本方可成独立之势。窃思所谓报国尽忠，此皆亦可在于此等事之中也”从书信的内容上推测，福泽

的“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是完全可以“报国尽忠”替换的定式。

然而，丸山认为，启蒙初期福泽的国际关系论是“国家平等”。他以这种错误的认识为前提，认为维新当初的福泽面前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把日本建设成‘国民国家，二是把日本建设成‘主权国家。’（《丸山集》14卷，281）通过“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这两个课题“内在联系成为最鲜明的定式，‘个人的自由和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和国家的平等，完全以同一个原理所贯穿，很好地保持着平衡。这对福泽的国家主义，不，对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来说，是美丽而薄命的古典式平衡时代’”（《丸山集》卷，232）不仅是丸山，还有服部之总、远山茂树、（一段时期的）家永三郎、加藤周广田正树、岩井忠熊等人的先行研究，无一例外地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对福泽《劝学》第三编“个人自立”的内容随意做了“民权的确立”、“个人的自由”、“近代国民意识”等解释。但是福泽本人对“个人自立”的内容没有做过任何议论。他只是认为，为完成“一国独立”这个自明的前提课题，需要“为了国家的‘报国大义’”57

我在前著中已经论述过，在战败前前夕的日本军国主义社会里，“一旦有危机”，日本国民必须以“死轻于鸿毛之觉悟”如同福泽的定式那样，“为国家”舍弃生命和财产。直到1945年8月15日正午“战争终结”的“玉音放送”那一瞬间，日本人一直只能这样生存，这样死亡。而且，正因为日本有这样的战时经历，以后理应要变成一个为“和平与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代。然而，对福泽的“为国家，不仅失去财产...这一单方面强求国民的‘报国大义’，即个人‘自立之气力’论的内容，战后的福泽研究却全然视而不见，对此我提出过疑问。这个疑问正是我多年来福泽谕吉研究的出发点。58

岩崎《日本近代思想史序说·明治前期篇》上（新日本出版社，2002年）看到了以下叙述：在满街充斥“斩尽杀绝”、“一亿玉碎”等标语口号的战争时期，岩崎阅读《劝学》，“因反对这场战争而感到孤独和痛苦，因此对《劝学》‘大约在三编中看到的那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他说的为国家·舍弃生命、·抛弃命，等说法，总觉得是岂有此理’”（250）“从那以来，对笔者来说，福泽成了与我无缘的思想家（64）我不想把这个岩崎和‘读起福泽的论著，就有趣得欣喜若狂’的丸山并列起来进行对比和评论。

岩崎说，他在20岁时阅读《劝学》“痛感其论点与十五年战争时期辅弼大政，迎合群众的文笔家论调……有一致之处...·感到惊讶而远离了此书”（63）。同一时期，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的丸山说：“反正读起福泽的论著，就有趣得欣喜若狂。与其说有趣，毋宁说有痛快淋漓之感。：...·尤其是《劝学》和这部《文明论之概略》读起来令人感到每一行仿佛在激烈地批判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始终感到酣畅淋漓。”（《丸山集》13卷，39）丸山于1942年和翌年先后发表论文《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和《福泽主张的秩序和人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福泽谕吉研究。

中野敏男属于比二人晚得多的后代（1950年出生）他在《大塚久雄与丸山真男—动员、主体、战争责任》（青土社，2001年）中，引用丸山的上述文章分析道：激烈的批判，有时等于‘积极的参与，’推出福泽的丸山本身，在全民参战的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对当时没有从底层把所有力量全部动员起来而产生参战力量不充分的状况感到焦虑不安。福泽正是批判了这一点”他引用丸山当时的一篇文章，“使国民从以往对国家秩序的不负责任和被动依赖状态中摆脱出来，从政治上把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他指出，当时的丸山“成了确信无疑的战时总动员论者”（172）59

10、《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62页

丸山关于“学生出征”的论文和逃避兵役

丸山真男受老朋友（林基）之托，在1943年11月25日的庆应大学《三田新闻》上发表了关于学生出征的文章《福泽主张的秩序与人类》（不是刊登在充斥着“征哉斯道”、“坚定决心、报国致死”等标题和刊登小泉信三塾长〔校长—译者注〕的《出征诸君》等文章的1月10日学生出征”号外上，而是刊登在25日的报纸上）。丸山在文章中对定式“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做指鹿为马的解释之后写道：可以说，在个人主义这一点上，福泽反而是国家主义者。他把国家置于个人内心自由之中……甚至可以说，福泽出现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只有拥有了个人的主体性自由，才能成为主动参与秩序的人”（《丸山集》2卷，29，白井厚《丸山真男与三田新闻》K三田评论，1”7年第4期丸山在定式“个人自立而一国独立”上，强行增添了他在“处女”论文结论中提出的“辩证法式的全体主义”思想。他说：“个人只有以国家为媒介，才能得出明确判断，而且必须站在不断地对国家保持否定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性自立的关系之中”（《丸山集》1卷，31国武英人《关于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论》，龙谷大学《国史学研究》第4期。

另外，据今井弘道的观点，丸山的这种“辩证法式全体主义”是寻求“自然权”和“国家主权”融为一体的“卢梭式民主主义”（《对国民战争责任的怀疑与丸山真男的国家主义》，《象》第4期，2002年秋）

11、《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306页

问题何在？丸山高度评价了福泽对“缺乏变通流畅之妙用”的批判。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福泽过剩的“变通流畅之妙用”的思维方式问题。借用德富苏峰的说法就是“善能与世推移而物不凝滞，是君之本领”（前记《明治人》八）根本不受原理原则拘束的福泽式思维，在启蒙初期，为了达到所面临的“自国独立”这个“最后、最高之大目的”，实现保守化的中期以后，为了维持和完成守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本愿”，分别融通无阻、自由自在地得以施展了。因此，福泽就近代的国家观、社会观、人类观，没能形成有体系的原理与原则。也就是说，从结果上看，他只留下一点点的思想。而且我推测，正是福泽的这种思想方法与丸山所说的“昭和前期超国家主义，”遥相呼应。

我认为，所谓的思想家，本来应该从历史的现实和对历史的阐述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自立性。也就是至少以此相对独立存在于直接的社会利害关系与现实之外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思想的现实功能和作用。福泽所提出的各种命题和演说，是根据倒退的历史现实主义，即根据现实追随主义和渐进主义，不断追从和追随现实，像变色龙似地变色和变节，由此确立了不修边幅、毫无节操的思想。当然，我并不认为福泽的这种局限性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责任。福泽思想“开放”的灵活性，不修边幅的无节操性，我们必须从它的背景中看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即当时尚未形成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否则我们对福泽的评价是缺乏公允的。

306

勤奋的福泽谕吉善于洞察事物的本质、局限性或错误（有时甚至是正当性，他虽然了解它们，但在启蒙初期为了达到“最后最高之大目的”“自国独立”，在转为保守化的中期以后，为了完成“强兵富国”和守护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毫不顾忌地把全力倾注于必要的实践课题之上。我对这种“了不起”的态度表示我的“敬意”。当然这与它所起到的负面历史作用是两回事。按丸山流的说法，福泽谕吉才是“真正罕见的保守主义者”。307

12、《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22页

尽管如此，在丸山就《福泽谕吉其人与思想》是》所谈的以下内容中，如果把“教育”一词替换成“启蒙”的话，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他是在谈他自己：“总之，所说的福泽言行……总是伴随着作用意识这样一个东西他自认为自己是教育家，也跟作用和这种使命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的教育，就是长期的精神改造。这句话是与下边的一句话相对比而言的，即我不是政治家，所以不干预政治。换句话说，他把赌注下在了长期的精神改造上”（《丸山集》15卷，308）22 - 23

13、《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217页

《劝学》开篇的“天不造人上之人”，对维新当初的日本社会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不在乎它是否与书的内容吻合只是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小册子的内容上）显然远离福泽的意图和想法，进一步产生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个句子对自由民权运动家和民权运动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冲击起到过进步作用，这是事实。但是，正如在本章具体分析的那样，福泽本人就像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解释的那样，并没有主张“天赋人权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思想家，尤其是对于接受“先进国”理论和思想成为可能的“发展中国家”思想史研究，不能把著述中所使用的术语和部分叙述从整体上下文中分离出来进行解释和评价。而且，也不能从一部分记述和用语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出发，分析和评价他的思想。也就是说，福泽的逻辑和它被人们所接受并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两回事。

我已叙述过我的忧虑，这种超出实际的解读与不严肃的学问研究，可能就是战后民主主义破产和破灭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关于福泽的影响和他所起到的作用，由于患有战争责任意识不感症的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的学问，专门重复进行美化福泽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只是单方面谈论福泽思想进步作用的结果。217 - 218

14、《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23页

以上我们对福泽天皇论的两部代表作进行了分析。然而，正如我们在前边叙述的那样，丸山甚至对这样的《帝室论》和《尊王论》评价道：“这两部著作...多次提到了从《概略》的君主政论‘后退’的问题。无论福泽对日本皇室呈献多少溢美之词，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把天皇排除在一切政治性决定的范围之外”（C《丸山集》14卷，342~343，着重号由丸山所加）我对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是个“门外汉”，但是我认为，在福泽主张的天皇制下的天皇，却具有以下功能：1“收揽日本人民之精神”；2“亲裁一决”“和战二议”；“缓和”、“缓解调和”“政党之不和”、“民心之不和”及人民的“愤怒”；（4使日军士兵“为帝室而进退，为帝室而生死，：5作为“大元帅陛下”指挥中日甲午战争；成为靖国神社的“祭主”等。这怎么能说是“把天皇排除”在政治和“政治性决定的范围之外”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丸山的意思。

相反，天皇制才是把“他人之灵魂付于我身（日本国民即臣民）”（《劝学》第八编）的“收揽精神”中心，这是（丸山如此谴责的）“权力偏重”的最大表现，国民“尊崇”其“尊严神圣”的帝室，这本身应该说是近代日本社会最大的“惑溺”。福泽谕吉的天皇论，是站在形成最大“权力偏重”和“惑溺”的最前列的。尽管如此，晚年（1986年）的丸山真男作为在野的文人，对此进行如此不痛不痒的评价，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的。

15、《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6页

从《丸山真男手册》第4期中得知了以下事实：其实，丸山真男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95年）委托其“门生”挂川富子（音译）“查阅《时事新报》对《教育敕语》是怎样报道和评论的”，“如果可能的话，要从《教育敕语》一直追溯到《修身要领》。两天后，挂川把本书《资料篇》4所列的《时事新报》社论和许多其他相关资料送到了丸山的手里。后来在3月份，丸山给挂川打电话说：“《教育敕语》不用再谈了，我明白了.....”（《丸山手册》第24期，66~6）恐怕丸山虽然已经认识到对自己学说进行大幅度修正的必要性，可是由于患病而没能做到吧

16、《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77页

“个人自立”，最起码首先要“生存”（即便对方是国家，我自己的生命是不能交出的，不能做牺牲品）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在自由主义近代“国民国家”，“思想与良心的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也是普遍得到承认的。当然，像福泽的“独立自主”那样“奉戴万世一系之帝室，仰其恩德”之类的独立自主，是出让人的内心自由的，这大概不是“个人自立”的姿态。

也就是说，近代社会的“个人自立”，劳动权和参政权是它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比如，我们市民对太阳旗、君之代”的强迫寸步不让，把这种“思想、良心、信教等自由”当作自己的信念加以确立。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国家（或迫使员工“过劳死，过劳死”的企业）因此，在征兵制存续的国家，断然拒绝把“生存”这个最大、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交给国家的征兵制，获得自己能够凭良心拒绝兵役”的权利，我们本身必须成为始终如一地拒绝兵役的主体正如西川长夫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如果国民停止为祖国而死的行为，国民国家早已不存在了”（《射程》281）。也就是说，“凭良心拒绝兵役”的斗争，在国民国家的墙壁上打开一道通风口，迈出了谋求解体国民国家的重要第一步。

17、《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70页

小松茂夫（《权力与自由》，劲草书房，1970年）指出，在“对战争的政治目的不提出任何疑问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态度完全相同。他指出，不问战争的目的就协助战争，日本人的这种不合理的态度，即“神秘的战争目的疑问缺乏症”“崇高到无知的程度”。当年，当弄清这种状态已扩展到全民规模的事实时，日本人政治意识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对“‘国家，的本质、起源、存在理由”的疑问（同上；73）。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不仅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包括丸山真男、大塚久雄久雄、三木清等最高知识分子精英在内的人，都作为“时代之子”，没能把“国民国家”本身当做疑问的对象。（68）正如西川长夫所说的那样，如世纪是“大量死亡”和大量屠杀的时代。据E霍布斯本推测，在“全民战争”时代，世界死亡人数达1.87亿（历史学研究会《战后历史学再考》，青木书店，200年，75）问题是，导致这场大量死亡的核心力量就是世界上的“国民国家”，杀人执行者就是“国民”本身。我在以“歧视与战争”为主题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写道：“在战争中只以（某）人属于敌对国国民（虽然本人没有责任）为唯一理由，合法地把蔑视、憎恶、排斥升级为杀人和杀戮。在这一点上，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歧视。（松浦勉、渡边佳代子编《歧视与战争》明石书店，1999年，13）国民国家的人民，由于征兵制度和国民教育制度，不得不被迫热爱祖国。借用西川的说法就是“不得不只因‘敌人’，这一名称，心甘情愿地杀戮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的杀人热情高涨到狂热的程度，国民就是“人造人”和“怪物”（《国国民国家论的射程》，以下简称《射程》，柏书房，1998年）。70

18、《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3页

“丸山真男为什么如此恣意地解释福泽谕吉呢？，作为被无视的当事人，这正是我非常想弄清楚的问题。

在我把本书赠送给某个人之后收到的一封回信，其中的一段话预示了解答我长年的疑问。这封回信的主人就是比丸山年长两岁的同时代人，也是在《思想科学》、“和平问题谈话会”、日本学士院等领域内与丸山平起平坐的人物。我认为：这个人的评价能成为与丸山真男近距离接触的同一代人的有力证词，所以我请求他允许公开书信的内容和作者的名字，他慨然应允了我的请求。

这个人就是206年2月去世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历任一桥大学校长、朝日新闻社评论顾问等职）。他在回信的最后部分写道：“我和丸山君在日本学士院也也在一起，对‘福泽论，等问题进行过讨论。我觉得他被自己（或许因一夜成名）的名声束缚住，没能正确地面对对自己（学术性批判）。”（括弧内的文字为安川所加）我当然不认为这就是答案的全部。关于“丸山为什么把保守的福泽加以神化了”的问题，我的直截了当的假设就是：被信奉为“永久革命论”者的丸山，他（在对女性问题的认识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意外种意外地未被人们所了解的本质上的局限性与保守倾向，对向，对“保守的福泽”产生了共鸣和同感。

19、《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4页

本书的副标题“解构‘丸山谕吉，神话”中的“丸山谕吉”，这个合我心意的名称正是我从饭田泰三那里借用的。现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饭田的原话：“服部之总一语道破，用‘福泽迷'的眼睛是看不到福泽的。对此丸山真男反击道，有时只有入迷到‘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程度才能看到（恋人的）真实。因此，丸山的福泽论令人不断产生疑惑：究竟哪些是福泽的客观形象，哪些是所谓丸山‘过分融会贯通'的福泽形象。这就是他的福泽论被称为‘丸山谕吉'的缘故”（《福泽手册》第91期）（1）

战后日本的学术研究，为什么没能正确认识福泽谕吉的真实面目？在研究方法上，无视“人云天不造...这样的传闻体；在引用福泽的言论时随意删除表示原则论的“本等词句；政治思想史学者在进行福泽研究的时候无视福泽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评价等等，实在是草率之极。总而言之，以丸山为首的学者们从《福泽全集》中只引用那些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部分（相反，对自己的观点不利部分却视而不见）这种恣意性研究方法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另外，当然我并不怀疑这是丸山真男的一种“善意”，他想告诉民众，日本也曾经存在过像“丸山谕吉”这样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并以此来激励战后日本民众走向（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民主化”。但是，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对福泽的学说不断地随意“误读”和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过分融会贯通”。战后民主主义正在重新回归到“战争国家”的现代日本，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对这种轻率和肤浅的“研究”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反省。在日本，教育和学术长期被政治所统治和蹂躏。作为它的反弹和反作用，民主主义学术和教育也产生变革这种现状的欲望，被略显紧迫的问题意识所驱使，不断重复进行了草率的政治性研究。但是，依靠这些“过分融会贯通”和编造的学术是改变不了社会现实的。我怀疑，这种草率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不是战后民主主义破产和破灭的原因之一呢？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和支撑这个民主主义的本国中心主义学问研究，被眼前的民主化所驱使（由于美国免除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搁置和忘却日本国民本身对持续到战败那一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应负的重大战争责任问题，结果把毫无顾忌地蔑视和歧视亚洲国家并站在侵略最前线的福泽塑造成了民主化启蒙的典范和第一人。与“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中的家永三郎不同，因论及共产党的战争责任问题引起学界关注的丸山真男，对被迫开赴战场的学生兵“海神学徒兵”呼吁“每个人要主动担负起祖国的命运”但他对自己把“弟子”送往战场的战争责任却一直缄口不语。没有解决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问题的日本，一直在走战争国家之路。发生“九一一事件”时，美国以报复的名义发动了侵略战争，日本则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参战”（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个事实迫使我们从根源上重新追究丸山真男们（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本身）的战后责任和战后民主主义的意义。我再重复一遍，一方面标榜“和平与民主主义”，一方面却要重新回归到“战争国家”的“战后民主主义”国家日本，它的学问研究没能克服“丸山谕吉”神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包括学者在内的战后日本社会缺乏战争责任意识。（4-6）

前言虽然丸山真男一直缄口不语，但福泽的观点却与丸山所得出的“典型的市民式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结论相互矛盾。（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勅语》的赞美）（1）

嗯，作者批评很实诚，也很有骨气，不过矛头有点歪，有些论据也是误读。战后民主主义当然有其盲点，但最重要的是客观环境没有让它有充分实现的空间，所以将日本当下的扭曲归因于战后民主主义是不太公平的。加上现在历史修正主义还把它批成自虐史观，真是腹背受敌，危机关头，真是要至于死地才能后生。加上丸山派弟子不敢批评老师，不敢批评福泽谕吉，确实是学术上的堕落。这点上我还是欣赏作者的勇气。

20、《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3页

据本书作者的观点，对福泽谕吉歪曲事实的美化主要起始于丸山真男。丸山以断章取义地引用福泽言论，根据主观臆测得出结论，故意隐瞒和歪曲事实等手段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美化福泽的神话。。

当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是战后启蒙思想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一种善意”，丸山作为“战后日本的启蒙旗手”，企图利用日本也曾经存在过如此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者的“神话”来激励战后日本民众和社会的民主化。

但是战后日本正在重新回归“战争国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制定有事法制、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的事实，是否跟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主流派”学者对福泽的评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

21、《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89页

丸山的福泽研究探究的并不是“福泽谕吉”的思想，而是“丸山谕吉”其人的思想。因此，他的福泽谕吉理论当然不可能是“谕吉的客观形象”，而是丸山“过过分融会贯通”的形象。

22、《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275页

丸山并没有触及“日本国家主义”之路与福泽谕吉的关系，却对这个“国家主义”之路做了这样的描述：“日本国家主义早已放弃国民解放的课题，把国民主义升华为国家主义，甚至进一步把它升华为超国家主义。...这是与国民的精神构造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在黑暗沉积的社会底层喘息的庶民大众—大众与‘国家观念’根本无缘，以至于使福泽下定决心把‘让全体人民头脑中树立国家思想，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当做一生的使命——正是依靠这种‘义务’，国体教育，成长为兼备忠于国家的精神和最低限度的产业即军事技术知识的帝国臣民。...国家意识并不是依靠对传统意识的克服，而是依靠组织动员进行灌输，结果.....大量产生出的不是作为政治责任主体的近代公民，而是万事靠‘天皇，选择的方向一概依赖于权威决断的忠实而卑屈的奴仆。”（《丸山集》5卷，66~69）

丸山并没有触及“日本国家主义”之路与福泽谕吉的关系，却对这个“国家主义”之路做了这样的描述：“日本国家主义早已放弃国民解放的课题，把国民主义升华为国家主义，甚至进一步把它升华为超国家主义。...这是与国民的精神构造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在黑暗沉积的社会底层喘息的庶民大众—大众与‘国家观念’根本无缘，以至于使福泽下定决心把‘让全体人民头脑中树立国家思想，当做一生的使命——正是依靠这种‘义务’，国体教育，成长为兼备忠于国家的精神和最低限度的产业即军事技术知识的帝国臣民。...国家意识并不是依靠对传统意识的克服，而是依靠组织动员进行灌输，结果.....大量产生出的不是作为政治责任主体的近代公民，而是万事靠‘天皇，选择的方向一概依赖于权威决断的忠实而卑屈的奴仆。”（《丸山集》5卷，66~69）

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研究，问题在于他总是脱离近代日本历史现实的进展考察福泽，所以他的福泽论贯把思想家福泽的主观责任搁置一边。这一点，即便是“自称福泽迷”的学者，也可以说是超出思想史研究允许限度的手法因此，中野敏男、姜尚中、西川长夫、今井弘道、国武英人等许多学者异口同声地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判。在这里我想仅就两点介绍一下代表性的批判。一是，这种说法缺乏对，福泽思想深层次的考察，导致了丸山的“健全国家主义”对“超国家主义”的两项对立框架；二是，如在前著中批判的司马辽太郎的两分法“光明的明治”和“黑暗的昭和”一样，这种说法使对近代日本历史的总体把握变得困难。

276-277

丸山在他的论文《明治国家的思想》中认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包括福泽在内的“民权论者”“转向为帝国主者”。中野敏男在评论这篇论文时认为，“转向”是从这样的错觉”开始的：因战争的胜利完成近代化，丸山专门从当时的国际“环境”说明“决定这种‘转向，的主因”’认为（前边已经引用过）“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由于成长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中，所以在性方面...成熟中野对此进行批判道，对于前者，应该把它当做“日本近代思想深层次问题的外部表现”来考察他的错觉，对于后者，即“转向”原因，当然应该从福泽“思想深层中寻找问题”（前记《大塚久雄与丸山真男》223~224）关于同一个问题，姜尚中写道：“虽然丸山把这种‘色调的时代性变貌，归咎于对日本来说是恶劣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但我不认为他深入挖掘了这种变貌的内在根据。”（姜尚中等《读丸山真男》状况出版社，1997年，24）

另外，中野敏男把丸山的“健全国家主义”对“超国家主义”这个两项对立框架看为“明治前期有辨别力的‘理性国家观’对“昭和前期无节制的‘宣扬皇道’的“精神态度的对照”，概括起来就是“明治前期的‘理性国家观’，对“昭和前期的‘超国家主义’，他批判道，相当于丸山的福泽研究“总结”的《文明论之概略>解读》“有意地把重要论点排除在外外”了。中野认为，“如果两者在精神、态度上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的确应该通过追究其原因，从实质上反省最终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超国家主义’近代化步伐”。中野指出：“为什么从这从这种‘精神、态度的对照’的观点，会产生这种落差？这个问题作为真正迫切的疑问浮现出来了。可以认为，整体上总结近代日本的重要视点就在于此，然而丸山的福泽研究“总结”书《文明论之概略解读》“在这部正是以福泽的‘最高杰作’为主题，分量多达三册新版书的著作，并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对理应特别重要的问题即对这种落差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追究”（中野上述书，25~27）这就是中野的结论。关于同一个问题，姜尚中则批判道：“丸山通过强调明治前期与军国主义时代的鲜明对照，使前者与后者的连续性变得模糊不清。他视而不见的是：军国主义式‘国家理性’，的豪言壮语，最终变成基于冷静的‘国家理性’认识，导致了获得、经营、防护殖民地的结局。（姜尚中上述书，23）

关于相同的问题，西川长夫则认为，这是“缺乏对国家或国民国家的疑问”的问题。他批判道：“尽管战后的历史学.....以皇家史观和军国主义为首要批判对象，但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战后的历史学没能把国民国家本身当做批判对象.....典型的实例见诸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该论文把近代国家规定为‘国民国家’，虽然指出了它隐藏着武力扩张和国家主义内心冲动的因素，但在国家主义前冠以修饰语‘超’，专门只对这个‘超’进行分析，把‘国家，和‘国家主义’，这个主体放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到一边去了”（前记《战后历史学再考》，80）

上述三名学者共同批判的是：丸山明明是进行思想史研究，但他把民权论者和福泽本人“转向”事象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一贯不想对福泽谕吉的思想做深入（内部）的考察，这就是丸山的手法另外关于“明治前期的‘国家理性认识，’对“昭和前期的超国家主义，”这个两项对立框架，三人也进行了批判：丸山只强调两者的对照，对为什么产生这种落差这个“迫切问题”，或者对两者的连续性这个重要问题却不闻不问。

相反，本书所做的工作是通过对福泽思想的深入分析，明确指出丸山的图式“明治前期有辨别力的‘理性国家观’=“健全国家主义”的错误。此外我想，本书通过分析福泽谕吉走上接受《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体制的必然思想路程，为解释日本的近代化变（堕落）成“昭和前期的超国家主义”的路程做了基础性工作。另外“健全国家主义”对“超国家主义”，这个两项对立框架本身就是错误的。丸山错误地把明治前期的国民意识理解为以福泽为代表的健全的国家主义”。正因为如此，他没能描绘出“健全国家主义”与“昭和前期的超国家主义”的联系以及它的展望我认为，本书也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丸山的这个二项对立框架，本来就是不可能弄清明治前期与昭和前期“连续性”的拙劣图式。

277 - 279

如果借用大沼保昭的观点，亚洲太平洋战争就是：日本“作为亚洲盟主，欲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基于脱亚入欧的信仰而产生的、无限膨胀的志向不停地向前迈进的步伐，是近代日本的轨迹达到的终点”（48）

279

23、《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86页

我高度评价启蒙初期福泽的“文明之本旨”论，但当然不认为它是“原理论”。原理论之所以是原理论，即使在《概略》中没有确立其原理，也必须留下福泽本人为完成并实现“个人自立”这一原理性课题而奋斗和努力的痕迹，这样才能称其为原理论。但是，福泽不仅基本上没有向这个方向迈进一步，而且在《概略》第十章中，主动提出封锁“个人自立”之路的建议。

24、《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22页

（编造事实）这是来自启蒙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一种“善意”的结论，丸山作为“战后日本的启蒙旗手”，企图利用日本也曾经存在过如此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的“神话”来激励战后日本民众和社会的民主化。然而，依靠这种掺杂“政治欲望和希望”的安逸而简单的学问研究，别说对民众的启蒙，就是对现实日本社会的变革也是不是不可能的呢？我难以拂去这样的疑问：在把“和平与民主主义”当做伟大祷告词（J，达沃）的战后民主主义社会里，这种安逸的研究手法，是否对于正在重新回归“战争国家”的战后日本的路程和现状（向海外出动自卫队、有事法制的制定等）也应负有推波助澜的战后责任呢？

嘛，条件和结论之间联系缺少论证，丸山的权益之计在当时也可以说无可厚非吧，国民精神重建需要一个正面的形象，他选择了福泽。至于实像和虚像的区别，不妨看作秘教和显教之间的差异，作为过渡期需要显教，到了显教已经不合时宜时候展示出秘教也是好事。

25、《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82页

我年龄五十过半，自己觉得总算“个人自立”了。这是1989年明昭和天皇去世时，面对悬挂在名古屋大学本部正门前的吊旗，学校教职工工会组织抗议集会之后产生的感觉人们丝毫不碰眼前的吊旗，反复齐声喊道“我们反对悬挂吊旗！”（连呼反对，但实际上支持）我终于发现了它的矛盾和欺骗性（应该把吊旗扯下来，认真叠好后交到校长手中）从此以后，我不参加工会组织的抗议集会，开始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呼吁有志者的阻止悬挂行动了。“太阳旗、君之代”权威主义性地支配国民的内心，反对悬挂国旗、齐唱国歌的运动，不应以平面式（具有组织防卫本能）的工会运动进行，必须以个人良心上的拒绝为轴心组织起来。我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战后责任。77 - 78

在日本，虽然政府承诺不强迫，但公立学校悬挂“国旗”、齐唱“国歌”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甚至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作为特权得以保障的国立大学，尽管没有来自“学习指导要领”的强迫，但已陷入了悬挂吊旗和国旗的全线崩溃状态，有的大学已开始常年悬挂“太阳旗”、常年演奏“国歌”了。如上所述，甚至是大学也毫无主见地过分追随众论。在这样的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眼下还是一条近乎绝望的艰难路程。但是，我们要反抗组织和上级荒谬的命令与指示，我们要把自己重新锻炼成不合作、不服从、抗拒价命令提出异议、内部告发的主体，始终贯穿这种生活方式和姿态可以说除此之外，没有承担战争责任、期待民主主义复活的道路。。。我们要...成为“必须与国民国家对决的主体，包括“对于民主主义多数派所进行的少数派市民不服从运动”在内，我们必须面对作为这样的主体而“个人自立”的艰苦路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吧。

并不是国民国家论“没有准备好出路”，这个出路必须由我们来开拓。82

热血的老爷子啊。。

26、《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的笔记-第169页

远山茂树在《福泽谕吉》（东京大学出版社，1970年的最后一章《评价上的问题》中写道：“必须明确指出，他不是近代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亚洲各民族平等、独立的主张者。但是，他的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起到了超出本人意图的作用。”该书在结论部分肯定地评价这种随意的解释和任意的解读。远山最后写道：“我要得出的结论是：使福泽的著作成为国民性经典之作的，是对国民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自觉性的解释和超出实际的解读能力。”

169

我所意识到的问题是：把和平与民主主义”当做“伟大祈祷”的战后民主主义，正在重新回归为战争国家，21世纪初日本的这种严峻现实，迫使我们对远山茂树山住正己等人肯定和接受的“超出实际的解释”和“解读”这种随意和任意的政治性“研究”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反省。在近代日本社会，学问和教育确实长期被政治所统治和蹂躏。因此，作为其反作用和反抗，战后日本的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由于想变革国家和社会现状的这种无可厚非的欲望和略显性急的问题意识，如同在福泽研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出实际的解释”和“解读”一样，反复进行随意的政治性解释，而且这种随意性的学问研究状况，也成了战后民主主义破灭和崩溃的原因之一。

170

《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